

美国的反恐困境与出路

——评戴维·基尔卡伦的《意外的游击战：
反恐大战中的各类小型战争》

修光敏

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基尔卡伦(David Kilcullen)所著《意外的游击战：反恐大战中的各类小型战争》一书是分析美国十年反恐僵局的一部力作。^①该书认为，“9·11”之后，极端伊斯兰“圣战者”的全球叛乱呈现出“意外的游击战”的特征，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恐怖分子渗入各地叛乱势力之中，通过与之结盟，不断扩大势力范围。美国反恐战略对此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甄别，企图通过严厉的军事打击一劳永逸地将两者一同剿灭，这反而促使原本存在矛盾的它们更加紧密地团结一致，共同反对西方，美国的敌人因此更加强大，反恐也陷入“越反越恐”的魔咒之中。

戴维·基尔卡伦提出了他的解决之道：全球恐怖分子与地方叛乱势力实际上诉求各异，龃龉颇多，美国应该将二者区别对待，努力使后者保持中立甚至与之结盟，共同打击全球恐怖分子。同时，美国需要摒弃单纯军事观点，通过各种手段保护民众免遭恐怖分子的威胁和煽动，由此才能将恐怖分子的影

* 修光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871）

** 笔者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于铁军老师的悉心指点和《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匿名评审专家的批评指正。本文错漏均由笔者承担。

① David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Fighting Small Wars in The Midst of A Big 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中译本参见〔澳〕戴维·基尔卡伦：《意外的游击战：反恐大战中的各类小型战争》，修光敏、王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版。

响降到最低。

恐怖主义是当前很多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共同挑战之一,中国的反恐任务亦十分艰巨。本文将对基尔卡伦的这部著作进行评介。

—

基尔卡伦 1967 年出生于澳大利亚,是当前国际反恐战线一流的战略学者和反恐、反叛乱专家。他著作颇丰,在《战略研究》(*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等期刊发表文章数十篇,除了《意外的游击战》外,他还撰写了《反叛乱》和《走出大山:城市游击战时代即将到来》等著作。^①其中《意外的游击战》是基尔卡伦着力最多的首部著作,其理论和案例生动详实,体现了他数十年在实践上的积累和学术上的思考,是了解这个时代反恐问题的必读之作。

基尔卡伦曾任美国国防部反恐协调办公室(the 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for Counterterrorism)首席战略家,并于 2005 年获邀撰写美国《四年国防评估》(*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中的非常规战争和反恐部分,同时,他以其丰富的实践知识和深刻的洞察力获得了中情局传奇式的反恐专家克拉姆顿(Hank Crumpton)及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肯定,获邀加入前者领衔的团队。此外,他还一直担任为奥巴马政府提供对外政策建议的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兼职教授。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跻身于华盛顿最受尊敬的反叛乱专家之列,但因为“原则性问题”,他最终于 2010 年选择了离开克拉姆顿团队,开始自己创建从事战略咨询的凯罗斯公司(Caerus Associates)并担任首席执行官。^②

基尔卡伦于 1984 年在澳大利亚圣庇护十世大学(St Pius X College)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在皇家澳大利亚军团(Royal Australian Regiment)担任步兵指挥官近 20 年。在此期间,基尔卡伦在世界各地执行军事任务,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他曾在印度尼西亚指挥军事顾问团,在塞浦路斯岛和布干维尔岛执行维和任务,为波斯湾国家反恐提供建议,与英国军队一起教授小部队战术

^① David Kilcullen, *Counterinsurgen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vid Kilcullen, *Out of the Mountains: The Coming Age of the Urban Guerrill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② Josh Rogin, "Why Did David Kilcullen Leave the Crumpton Group?"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17, 2010, <http://foreignpolicy.com/2010/02/17/why-did-david-kilcullen-leave-the-crumpton-group/>. Accessed 16 March 2015, 2015-03-16.

(small-unit tactics),并于1999年指挥一个连队在东帝汶开展反叛乱行动。

在执行军事任务的过程中,基尔卡伦借机在伊斯兰世界了解村庄、部落和市民的风俗习惯和信仰,并逐渐将兴趣锁定在研究部落、宗族、村庄、教派等通过共同的文化传统、经济活动和信仰体系塑造民众的身份认同,以及这些社会团体内部和之间的冲突。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之后,他开始进一步关注伊斯兰圣战者进行的“全球叛乱”。在去往印度尼西亚服役之前,他花了一年时间在澳大利亚国防大学外国语学院进行语言和文化培训,这使得他精通印尼语,并兼通阿拉伯语和法语,为其在印度尼西亚进行的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基尔卡伦的博士论文研究深受法国军事学者大卫·加鲁拉(David Galula)的影响。^①2000年,基尔卡伦凭借其论文《1945—1999 印度尼西亚军事行动的政治后果》一文获得南威尔士大学澳大利亚国防学院政治人类学(Political Anthropology)博士学位。他利用政治人类学的方法,以西爪哇岛的伊斯兰分离主义叛乱和东帝汶的种族分离主义叛乱为主要研究案例,分析传统社会中的叛乱、反叛乱及恐怖主义的政治影响。

2004年,基尔卡伦在澳大利亚军队总部担任陆军中校,负责分析各类冲突类型,之后又被临时借调至外交贸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trade)参与制定澳大利亚反恐政策。也正是在这一年,由于能力出众,应美国国务卿赖斯办公室请求,基尔卡伦被调派至美国国防部,2005—2006年,基尔卡伦在美国国务院反恐协调办公室担任首席战略家。

虽然置身于美国反恐最高决策圈,但基尔卡伦在面对问题时仍坚持自己的判断,不盲从。早在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基尔卡伦就是少数几个敢于直言进谏的顾问之一,他曾告诫美国人在战争中的付出将远远超过他们所愿承担的成本,而且美国人一旦介入,绝难退出。^②当时,他的观点并未引起注意,但之后的事实却印证了他的远见。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基尔卡伦并未因此恃才自傲。2007—2008年,他受命担任美军驻伊拉克司令彼得雷乌斯将军的高级顾问,这正值伊拉克战局最危险的时期,但他不畏艰险,2/3的时间都在与伊

^① 大卫·加鲁拉(1919—1967)是一名法国军事指挥官和学者,在发展反叛乱战争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颇有影响力。曾参与希腊内战、阿尔及利亚战争,并研究过法国的印度支那战争,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反叛乱理论至今仍影响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关于大卫·加鲁拉,可参见葛腾飞、苏昕:《美国“反叛乱”理论的发展及其困境》,《美国研究》,2012年第1期,第27—46页。

^② David Ignatius, “A Strategy to Win back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The Toronto Star*, March 22, 2009, p. A17.

拉克军队和盟军、警察、地方重建队、救援人员、情报人员、村落及地方团体领导人一起从事外勤工作。正是通过这些深入一线的扎实调查,基尔卡伦帮助美国制定了增兵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伊拉克局势。

在阿富汗问题上,基尔卡伦利用2006年夏秋和2008年春天领导研究团队在阿富汗进行实地考察,通过圆桌会议、访谈等方式采访当地民众、官员、非政府组织甚至叛乱分子,掌握了大量原始资料。正是由于这些丰富的经验,基尔卡伦曾于2008年担任白宫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战略审议团的成员,自2009—2010年,担任北约和阿富汗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的反叛乱顾问。在此期间,他批评奥巴马政府的无人机袭击不仅未能稳定当地局势,反而使得阿富汗民众感觉更不安全。

正如基尔卡伦自己所说,偏僻山区的民众和部落及宗教团体领导人教给他的关于游击战和当地环境的复杂知识,远多于他之前从书本中所能学到的。^①这种深入实践的风格在《意外的游击战》一书中也有相当清晰的体现。

二

《意外的游击战》刚问世,就得到《纽约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多伦多星报》《经济学人》《军事史期刊》(*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战争史》(*War in History*)等主流媒体和期刊的报道。基尔卡伦本人也接受了《纽约客》等杂志的采访且受到赞誉。

全书分为五章。基尔卡伦首先提出“意外的游击战”这一核心概念及相关理论,其次借助这一理论详细论述了阿富汗和伊拉克这两个案例,接着以较小篇幅论述了恐怖主义在巴基斯坦、东帝汶、泰国南部、欧洲这四个国家和地区产生和发展的情况,最后作者基于这些案例总结了这些地区恐怖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并有针对性地对美国及西方提出对策建议。作者在该书中成功地运用人类学方法,同时利用职务便利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使得该书成为反恐反叛乱方面的重要著作。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 分析恐怖主义产生的四种模式

在该书中,基尔卡伦试图解释为什么自“9·11”以来,美国在全球反恐上

^① David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Fighting Small Wars in The Midst of A Big O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x iii-x iv.

耗费大量资源,却最终陷入“越反越恐”的窘境。不仅全球反恐战场遍地狼烟,而且美国的国际声誉也严重受损。面对如此局面,究竟何种政策才能标本兼治,成为研究者和决策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对于当今恐怖主义兴起的背景究竟该如何理解?基尔卡伦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模式:(1)对全球化的强烈抵制。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通过“去殖民化战争”实现了独立,但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化这一史无前例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内造成富人(haves)和穷人(have-nots)的分野。一方面,一些传统文化和认同遭到全球化严重侵蚀的社会将自身处境的窘迫归罪于西方;另一方面,全球化工具使得恐怖组织能够动员更多力量来反对和打击西方。(2)全球性叛乱。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这种反叛势力利用挑衅、威吓、拖延、消耗等手段,试图从12亿逊尼派穆斯林中获取支持,最终目标是颠覆当前的国际秩序和领土现状。这意味着应对这股势力最恰当的方法是反叛乱而非反恐。(3)伊斯兰世界的内战。虽然基地组织要打击的对象是西方,但它首先要推翻的却是穆斯林世界现存的权力结构,要控制的是中东的政府和民众。该理论认为,美国将基地组织列为头号敌人并全力以赴予以打击,反而增加了基地组织在穆斯林中的威信和影响力。(4)不对称战争。该理论认为,正是因为美国在常规战争中前所未有的压倒性优势,使得任何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只能通过非常规战争来规避美国的绝对优势。这就是恐怖主义、叛乱、国内冲突及非传统战争的潜在战略逻辑。

基尔卡伦认为这四种模式并非相互排斥,而是提供了一系列相互补充的概念视角。通过这些模式理解了当前国际安全环境之后,他进一步提出了“意外的游击战”这一理论,并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

(二) 提出“意外的游击战”理论

基尔卡伦认为,“9·11”之后,基地组织所期望的伊斯兰世界的大规模暴动并未发生,而且在国际社会的严密防范和美国的军事打击下,类似于“9·11”袭击这样的远征型恐怖主义(expeditionary-style terrorism)难以再度实施。在这种情况下,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恐怖分子不断渗入当地本土势力之中,通过“意外的游击战”这一新模式来打击西方和国际社会。^①

为了阐明这一模式,基尔卡伦创造性地借助于生理学知识将其描述为循

^① David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p. 33.

环往复的四个阶段:第一,感染(Infection)。在许多失败国家,存在着以部落血缘或宗教信仰为认同的团体,这些团体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长期独立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外。在这些地区,恐怖分子一方面利用同属穆斯林的身份认同,通过联姻、走私、贩毒等手段为当地提供利益;另一方面对不合作的部落予以打压、威胁、恐吓,从而不断渗入和控制当地本土势力。第二,扩散(Contagion)。恐怖分子以此为根据地,不仅通过恐怖活动将塔克菲理(Takfiri)主义^①在周边地区不断扩散,而且通过互联网等全球化工具将影响力传播到世界各地。这样就对恐怖势力所在国以及西方国家造成了严重威胁。第三,干预(Intervention)。恐怖分子的影响扩大之后,外来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予以干预,这些外来者既可能是所在国中央政府,也可能是西方国家;可能是暴力的,也可能是非暴力的,但一般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副作用。这些外部干预往往都会使那些最开始原本反对恐怖分子渗入的当地民众和团体,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转而与之合作。第四,排异(Rejection)。国际恐怖分子与当地本土势力团结一致共同抵抗外来干涉。此时,这些恐怖分子会借机把自己打扮成当地利益的捍卫者,而当地民众也认为,相较于西方,这些人同属穆斯林,关系更亲密。因此他们也会和恐怖分子并肩作战来反对外部干涉。这样一来,原先仅是想打击恐怖分子的外部势力最终不得不与所有当地民众作战,从而深陷战争泥潭难以自拔。

(三) 分析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等地的案例

在提出理论模型之后,基尔卡伦用阿富汗、伊拉克、东帝汶、泰国南部、巴基斯坦及欧洲的案例对此进行了论证。“意外的游击战”的这四个阶段最为明显和完整地体现在伊拉克和巴基斯坦边境这两个案例中。

在伊拉克的案例中,该模式的四个阶段都得到了完整的体现。第一,以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AQI)为代表的恐怖分子一方面利用同属逊尼派的身份便利,另一方面利用恐吓威胁等手段秘密潜入逊尼派社区,并逐渐在这些社区内部建立起组织网络、后勤保障、民众支持、弹药供应。第二,在逊尼派社区站稳脚跟之后,恐怖分子开始扩展恐怖活动。他们不仅通过爆炸袭击等暴力手段

^① 塔克菲理(takfiri)是基尔卡伦在该书中用以描述敌人意识形态的术语,而“塔克菲理恐怖分子(takfiri terrorist)”是指那些使用恐怖主义来推进这种意识形态的人。塔克菲理的教义认为那与塔克菲理的信仰不同的穆斯林都是异教徒,他们必须被杀死。这种教义背叛了《古兰经》关于在宗教中反对强制的指令,在穆斯林世界被斥为异端。参见 David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p. X VIII。

蓄意攻击周围的什叶派居民,造成其大量人员伤亡,而且袭击什叶派清真寺和圣殿,通过这两种途径蓄意激起什叶派对逊尼派的敌视和仇恨。第三,什叶派被迫对逊尼派民众展开报复性活动。虽然什叶派民兵武装采用种族清洗的方式大量杀害和绑架逊尼派民众,但此时恐怖分子和极端组织早已潜入地下隐藏起来,因此什叶派无法找到真凶。更为恐怖分子所乐见的是,已被什叶派宗派极端分子大量渗入的伊拉克政府也通过停止为逊尼派社区提供水电、金融等公共服务来打击逊尼派团体,这激起逊尼派对中央政府的敌视。第四,被逼走投无路的逊尼派民众只得投靠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及其他极端势力,而这些恐怖组织趁势将自己装扮成逊尼派利益的保障者和维护者,从而获取更多逊尼派民众的支持。至此,逊尼派民众和恐怖组织联合起来共同反抗伊拉克政府和盟军,一场大规模宗派流血冲突的恶性循环席卷伊拉克。^①

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情况与伊拉克十分类似,只是具体的行动主体由基地组织换成了塔利班。第一,早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塔利班就与阿富汗游击队并肩作战,共同反抗苏联入侵。战争结束后,他们通过与当地部落联姻,指派地方领导人,开展慈善活动,提供商业服务,赞助伊斯兰宗教学校等手段渗入巴基斯坦西北部的部落之中。^②第二,塔利班开始进一步破坏当地传统社会结构。长期以来,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交界地区通过由部落领导层、宗教机构、政府代理人三股势力彼此制约形成的三角统治模式,实现了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主与平衡。但塔利班进入该地区之后,消灭或取代了政府代理人,迫使部落领导层与之结盟,边缘化温和派宗教领袖,从而迫使当地宗教机构完全按照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行事。因此在21世纪伊始,塔利班已渗入巴基斯坦联邦直辖部落地区(FATA)的部落社会当中,并建立起强大的当地同盟。在当地的势力得到巩固之后,塔利班开始进一步向西北边境省和巴基斯坦主要城市不断扩大势力范围和影响力。第三,面对塔利班势力的不断扩张,美国于2002年7月督促巴基斯坦政府派遣地面部队进入联邦直辖部落地区清剿塔利班。巴基斯坦政府军开进邻近阿富汗边境的开伯尔特区(Khyber Agency)和瓦济里斯坦(Waziristan),打击从阿富汗逃来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高层领导人,这是自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常规部队第一次进入联邦直辖部落地区开展

^① 对于这种什叶派敢死队驱逐逊尼派,逊尼派报复什叶派的恶性循环,驻伊拉克美军司令乔治·凯西在其回忆录中也有描述。参见 George W. Casey, *Strategic Reflections: Operation Iraq Freedom*,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October 2012, p. 111。

^② David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p. 235。

行动。第四,穆沙拉夫政府的这次军事干预立即激起了当地部落社会的抵抗。当地部落认为政府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对其进行压迫和控制,因此在2004年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部落公开叛乱,双方间爆发大规模流血冲突,这也成为一个世纪以来巴基斯坦最大的一次部落起义。在这种背景下,当地部落和塔利班进一步团结起来,这导致一方面潜入阿富汗的塔利班大幅增加,另一方面暴力恐怖活动蔓延到整个巴基斯坦,导致了“巴基斯坦塔利班化”。^①

除这两个地区之外,基尔卡伦还重点论述了阿富汗的案例。他在亲自调查的基础上,辅以广泛查阅资料,结合当地地缘政治环境和社会文化心理,详细而系统地论述了阿富汗塔利班的人员构成、组织结构、战斗技术、武器装备、宣传策略、毒品政策、最终目标、与当地部落关系、从外国获得援助、渗入当地部落并不断扩张等方面内容,并且对阿富汗政府的腐败、低效、不作为、缺乏反叛乱训练进行了批评。

此外,基尔卡伦通过论述美国领导的盟军与阿富汗政府在库纳尔省的成功经验,第一次正式提出并详细阐明避免意外的游击战这一恶性循环的应对之策:实施以民众为中心(population-centric)而非以敌人中心(enemy-centric)的战略,通过全天候地保护民众免遭恐怖分子威胁和影响,迫使恐怖分子离开民众,使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阿富汗东部的库纳尔省,正是美国领导的盟军与阿富汗政府共同修建库纳尔公路这一过程成为打破塔利班对这一地区长期控制的关键。在筑路过程中,同为塔利班所排斥的部落长老和政府代理联合起来,改变了恐怖势力在该地区一家独大的局面。第一,部落长老拥有雇佣权、任命权和资金,这能够在部落中重塑部落长老权威,同时削弱恐怖分子的权力。第二,公路修通之后,以军警为代表的政府势力能够深入原本为恐怖分子统治的地区,从而将民众与恐怖分子隔离开来。第三,交通安全得到保障之后,民众开始投资农作物,市场开始繁荣起来,极端宗教势力的影响被削弱。

基尔卡伦对当前恐怖主义发展壮大的论述既有理论意义也有现实意义。从理论意义上来说,作者提出了“意外的游击战”这一理论模型,详细论述了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采用消耗、拖延、威慑、挑衅等手段,历经积极渗入、传播影响、外来干预、共同抵抗这四个发展壮大的阶段。该理论模型是对当前全球化时代国际恐怖组织、当地本土势力以及西方国家三大力量博弈

^① 钱雪梅:《巴基斯坦塔利班现象解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2期,第53页。

互动的概括,符合“9·11”以来全球最新反恐态势,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美国近年来持续反恐,但“越反越恐”的内在逻辑。

从政策意义上来说,基尔卡伦在此书中不仅抨击了美国企图一味通过高科技武器击毙恐怖分子来消灭恐怖主义的“短平快”的做法,而且探讨了这一政策背后的原因,认为这与美国国内的选举政治结构和军事工业复合体密不可分。^①因此,作者建议美国在反恐战争中不能只重视高科技武器的运用,还应充分考虑人的因素。这一方面要求美国大量培训救援人员、语言学家、反叛乱专家、建筑工程队等非军事人员,^②另一方面要求美国依据当地传统与部落、宗派等非国家团体充分沟通,实现和解。比如,2007年,美军在伊拉克与部落势力合作共同打击基地组织,就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作者的澳大利亚籍身份,他能独具慧眼,也更便利地指出技术高度发达的美军存在对人的因素重视不足的问题,^③这无异于对美军当前的政策敲响一记警钟。

三

总的来看,该书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使用人类学方法来研究部落、宗派等非国家团体,成为当前研究恐怖主义的一把钥匙

基尔卡伦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当地社会,观察到许多独特且重要的政治文化现象。在伊拉克,当部落中出现纷争时,部落之间存在一套古已有之的和解程序,包括中间人的寻找,中间人与双方酋长的接触,赔偿

^① David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p. 27.

^② 在这方面,与基尔卡伦一样,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和驻阿富汗美军司令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Stanley McChrystal)也意识到,虽然美国拥有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但在阿富汗最稀缺的是熟悉阿富汗语言、历史和文化的“阿富汗通”。这位在阿富汗的最高统帅充满热情地积极推动任命几百名“阿富汗通”进驻阿富汗的计划,并将其视为最强大的资产。因此,2009年3月,在军事行动之外,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进在阿富汗的民事行动。美国政府号召农业专家、教育者、工程师和律师去阿富汗,以促进当地的安全和公平,并帮助阿富汗政府服务民众。这说明奥巴马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些民事行动构成了拒斥塔利班影响力的政治战略的核心,至少已将反恐与反叛乱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参见〔美〕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重任在肩:一位美军四星上将的军事回忆录》,蔡健仪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73、339页;Robert M. Gates, *Duty: Memoirs of A Secretary at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14, p. 343.

^③ George Packer, “Knowing the Enemy,” *The New Yorker*, Vol. 82, No. 42, December 18, 2006, p. 60,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6/12/18/knowning-the-enemy?currentPage=all>, 2015-03-16.

金额的确定等各个环节,^①而政府的司法程序完全被排斥在外。

基尔卡伦对驻在国社情民意的深入考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他克服语言、种族和信任方面的困难,通过实地调查的人类学方法了解伊拉克部落民众的心理、文化和传统,研究逊尼派部落的和解程序,并在尊重逊尼派部落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伊拉克政府及美军与之和解的具体办法。^②诚然,作为美军驻伊拉克的最高军事统帅,凯西以美国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正如《孙子兵法》所指出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能像基尔卡伦这位澳大利亚人一样放下身段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认真考察对手,胜利的把握应该会更大。

而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区,普什图人构成当地人口的绝对多数,他们有自己的部落,完全以血缘亲疏论敌友。^③由部落长老组成的“支尔格大会”(jirga)依据传承了一千多年的普什图法则(Pashtunwali)来解决纠纷和维持秩序,^④两国政府无法直接管辖。

关于阿富汗的这种社会结构方面,麦克里斯特尔也深刻地意识到从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阿富汗饱经战乱。这些战争在各个地方削弱了传统领导人的地位,却将非传统的领导人推上权力位置,而后者往往更加极端和偏激,这固化了家族、部落等传统社会结构,因而使得统一的现代阿富汗民族国家的出现遥不可期。^⑤这与基尔卡伦从人类学的角度对阿富汗的分析是一致的。

总之,失败国家为恐怖主义在当地的滋生提供了土壤,而恐怖组织通过与当地部落、教派等非国家团体结成同盟而不断壮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正有效的似乎并不是关于对精英所控制的民族国家间互动的研究,而是向基尔卡伦那样,从社会角色、组织、地位、制度、认同等方面对部落、教派等非国家行为体进行人类学研究。因此,恐怖主义的发展与非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紧密相连,今后解决恐怖主义的根本之道或许也蕴藏在后者之中。

(二) 从民族国家构建的视角分析恐怖主义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近代以来,西欧所产生的民族国家的基本结构是国家直接对接原子化的个人,在这种“国家一个人”的模式下,国家保障个人权利,个人对国家履行义

① David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pp. 167-168.

② 关于基尔卡伦对此的深入分析,参见 David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pp. 158-176.

③ Ibid., p. 74.

④ 钱雪梅:《巴基斯坦塔利班现象解析》,《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2期,第51—60页。

⑤ [美]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重任在肩:一位美军四星上将的军事回忆录》,蔡健仪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250页。

务,因而,政府可以在国内全面有效地行使管辖权,不存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势力与恐怖组织结盟。在这些国家,即使产生了恐怖活动,政府也能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局面,不会导致经久难治的后果。

但伊拉克和阿富汗等中东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则是另一种模式。在这些地区,与西方迥异的传统权力和文化结构,使它们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更多地呈现出“国家—部落—个人”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与个人不直接发生权利与义务关系,个人的第一认同和效忠对象是部落。这一方面导致国家无法动员和运用足够的资源来打击恐怖分子,另一方面使得政府在国内难以全面有效地行使主权,恐怖分子因而能够利用这些权力真空渗入当地发展壮大。^①

芮科德曾经批评美国往往将战争与政治隔离开来,将军事胜利视为战争的终结,而忽视了战争仅仅是实现政策的工具。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军事胜利只是开始,而非结束。”^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马斯·哈默斯(Thomas X. Hammes)声称:“反叛乱中根本的武器仍然是善治。”^③基尔卡伦进一步认为“现代反叛乱战争也许百分之百是政治性的”。^④这种认识比某些美国高级军事指挥官更为深刻。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应对伊拉克问题,凯西和基尔卡伦都在书中建立了自己的模型。前者将伊朗、逊尼派极端组织、什叶派极端组织和抵抗组织视作导致伊拉克社会分裂的四个并列因素;后者将恐怖主义、叛乱活动、宗派和种族冲突及国家的脆弱性当作导致伊拉克乱局的因素,并且指出前三个因素相互叠加,最后一个因素是前三个因素产生的土壤。诚然,在反叛乱的角度考虑伊朗是必要的,因为邻国很可能对本国的叛乱势力予以援助。^⑤凯西的军事手段也十分讲究策略,包括接触和保护民众,进行必要的巡逻和情报行动,培训伊拉克部队并逐步将维护安全的责任转交给他们。但是,他未能像基尔卡伦那

① 此观点受北京大学历史系钱乘旦教授在《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课程中讲授内容的启发。

② Jeffrey Record, *The American Way of War: Cultural Barriers to Successful Counterinsurgency*, Washington, D. C.: Cato Institute, September, 1, 2006, <http://object.cato.org/sites/cato.org/files/pubs/pdf/pa577.pdf>.

③ Thomas X. Hammes, “Countering Evolved Insurgent Networks,” *Marine Corps Gazette*, Vol. 91, No. 10, Oct. 2007, p. 86.

④ David Kilcullen, “Counterinsurgency Redux,” *Survival*, Vol. 18, No. 4, 2006, p. 123.

⑤ 彼得·帕雷特(Peter Paret)和约翰·沙伊(John W. Shy)讨论了塞浦路斯的案例,参见 Peter Paret & John W. Shy, *Guerrillas In The 1960's: A Background Study of Modern Guerrilla Tactics*, London: Pall Mall Press Ltd., 1962, pp. 29-30.

样在书中明确提及,伊拉克之所以会长期陷入混乱,其深层次原因正是在于伊拉克是一个失败国家,新政府的各项能力建设严重不足,以至于无法提供必要的法治和秩序,这恐怕才是当地乱象丛生,而美军深陷其中的根本原因。^①

(三) 揭示国际恐怖主义虽然渗入了地方反叛势力之中,但二者存在结构性矛盾

基尔卡伦在其理论模型中已反复说明,基地组织在失败国家建立避难所的活动实际上经常遭到当地民众的抵抗,当地民众将基地组织视作外来者,并且认识到,他们并不会带来实质性利益。面对这一局面,基地组织清除当地反对部落领导人和温和派宗教领导人,强制联姻以建立同盟,收买前来干涉的政府代表,仲裁当地纠纷,为当地经济提供资金,通过这些方式建立起并不稳固的优势。尽管基地组织表面上扩大了势力,但事实上对当地团体缺乏本质上的吸引力。^②

基尔卡伦细致敏锐地剥开两者合作的外衣,深刻揭示它们之间的矛盾,这一点得到了许多战略学者的关注和肯定。正如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Wolverhampton)的斯宾塞·琼斯(Spencer Jones)所言,基尔卡伦指出了当前“意外的游击战”的新特点,即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煽动力极强的全球化组织使得我们面临的游击战更为复杂。正如本书的副标题“反恐大战中的各类小型战争”所揭示的,恐怖分子与游击战士绝非铁板一块,各个地区的反恐战争也绝不相同。

美国堪萨斯州莱文沃斯堡(Fort Leavenworth)外国军事研究办公室的莱斯特(Lester W. Grau)在评论该书时也谈道,“有人将游击战视作某种整体性的斗争,但本书论及的游击战中存在许多个性鲜明的小型战争,这对他们是有利的提醒”。^③ 美国海军研究生院(U. 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的卡莱夫·赛普(Kalev I. Sepp),曾在美国国防部负责全球反恐事务,他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还特地提醒人们注意,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世界虽然表面上持有同样

^① 对于伊拉克政府代表性与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凯西也曾简略地提到,但他并未将其与伊拉克的各种问题联系起来详加说明,而只是将其作为伊拉克需要更多美国支持的依据。参见 George W. Casey, *Strategic Reflections*, pp. 11, 113。另外,关于两位作者看法的差异,读者可以通过两者分析伊拉克问题的模型图一目了然地看出来。凯西的模型图参见 George W. Casey, *Strategic Reflections*, pp. 93, 95; 基尔卡伦的模型图参见 David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p. 150。

^② David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p. 36。

^③ Lester W. Grau, “The Book Review of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Fighting Small Wars in The Midst of a Big One*,”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74, No. 1, January 2010, pp. 323-324。

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也绝非铁板一块。因此,基尔卡伦将国际恐怖分子与当地游击战士区分对待,将各个地区的反恐战争逐一考察,这比“他们都是恐怖分子”的简单判断高明得多。而且应当看到,当前基地组织的狂热分子及其塔克菲理的意识形态不仅是西方国家,而且是全球穆斯林社会的共同敌人。^①

颇受尊敬的战地记者雅尼娜·迪·乔瓦尼(Di Giovanni Janine)就认为,在战略设计上,华盛顿未能细致审慎地将全球性恐怖组织与地方叛乱势力区分开来,仅仅关注于在世界范围内打击基地组织这一全球战略图景,而忽视了各个地方斗争的具体情况,从而导致无法有效地应对各地的小型战争。^②

(四) 在现实反恐政策层面上,反对以敌人为中心的方法,倡导以民众为中心的策略

虽然基尔卡伦在书中倡导的以民众为中心的解决之道并非其首创,而是借鉴了《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反叛乱战地手册》一书的思想,^③但基尔卡伦通过自己的实际经验和生动案例将这一方法阐述得更详细,也更为人所信服。^④

基尔卡伦在论述阿富汗的案例时就将这两种战术做了对比。以敌人为中心的战术也可以称为“搜寻毁灭”(search-and-destroy)战术,安全部队在农村地区进行扫荡,在民众中寻找敌人,“这犹如在一堆干草堆中寻找一根绣花针”。^⑤因为恐怖分子行动自如,机动性强,对地形了如指掌,且能够很方便地隐藏在民众当中而难以识别,所以,为了寻找这根“绣花针”,往往要毁掉整个“干草堆”。更严重的是,以敌人为中心的战略还会引起民众的强烈抵抗,产生大量的意外的游击队,并使得民众和敌人团结在一起。正是认识到这种弊端,驻阿富汗美军司令麦克里斯特尔明确指示要停止以敌人为中心的策略,转而将保护阿富汗民众的安全放在第一位。这并不仅仅是出于道德上的考虑,更是获得最终胜利的必要条件。此外,为了杜绝部队只关注击毙叛乱分子,或由此导致的对民众的误杀和附带损伤,麦克里斯特尔废除了击毙叛乱分子的数量这一指标。有趣的是,作为回应,奥马尔也指示塔利班“要最大限度避免平

① Kalev I. Sepp, “The Book Review of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Fighting Small Wars in The Midst of a Big One,”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5, No. 2, Summer 2010, p. 356.

② Janine Di Giovanni, “Local War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pril 26, 2009, p. 21.

③ Sarah Sewall, et al., *The U. S. Army/Marine Corps Counterinsurgency Field Manua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④ Lester W. Grau, “The Book Review of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Fighting Small Wars in The Midst of a Big One,”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74, No. 1, January 2010, pp. 323-324.

⑤ David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p. 96.

民伤亡”，以免尽失人心。^①

从伊拉克战争爆发直到2005年早期，由于美军并不住在伊拉克居民区中，他们与民众鲜有接触，既不认识当地人，也不知道该信任谁。一名特种部队士兵甚至坦言，他从没见过一名未铐着手铐的伊拉克人。^②因此，美军在伊拉克实行的都是以敌人为中心的战术，将直接击毙或抓捕重要敌人作为核心任务。但这种战术却导致美军损失惨重，基地组织有机可乘，而伊拉克局势不断恶化。到2006年12月，平民死亡率达到最高峰，每晚有125人被杀害。为应对这一局势，2007年，美军增兵伊拉克并开始实施以民众为中心的战术。美军开始保卫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社区，并意识到当地部落与基地组织的矛盾，从而促成了逊尼派部落与伊拉克政府军的合作，共同打击恐怖组织，伊拉克局势才有所好转。

以民众为中心的战略则意味着军队在当地长期驻扎，以保护民众，与民众互动，使其免遭敌人的威胁和影响。长此以往，敌人或者逃遁他处，则丧失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或者被迫攻击早已设防的区域，则正中政府下怀；或者因为寻找食物和药品不慎暴露，则很可能被政府抓获。^③

在基尔卡伦看来，任何想通过严厉的军事打击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恐怖主义或将成为我们面临的一个时代性问题，很可能像冷战一样持续数十年之久。美国仍然需要实行以民众为中心的战略，需要发展可信赖的当地同盟，需要加大对非军事部门的投入，还需要处理好反恐以外的其他问题。

（五）重视田野调查，从现实中提取一手资料，使本书鲜活而生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基尔卡伦深谙此中要义。他在书中作为案例详细论述的这几个地区，几乎都留下了其脚印。每个地区的反恐都有其独特性，只有亲自考察才能掌握最为真实丰富的信息，也才能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见，避免人云亦云。

关于这一点，仅在阿富汗的案例中就有两个明显的例子。其一，在阿富汗库纳尔省的案例中，基尔卡伦首先介绍了库纳尔独特的地理环境：山高谷深、交通闭塞，封闭落后，河流全年无法通航，民众沿河谷而居。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当地普什图人颇具特色的民族性格：好斗勇猛、有仇必报、热情好

① 〔美〕麦克里斯特尔：《重任在肩》，第278—279页。

② David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p. 124.

③ Ibid.

客、服从部落长老权威、以血缘亲疏论敌友。正是这种对当地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的详细考察,使人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塔利班能够在当地深入扎根和外来势力难以在当地实行直接统治的原因。

其二,基尔卡伦通过实地考察发现,在阿富汗要想赢得反恐战争,必须因地制宜,对南部和东部实行不同的策略。阿富汗南部人口的80%居住在坎大哈(Kandahar)和拉什卡尔加市(Lashkar Gah),因此,美国的战略重点应该是保护这两个城市的民众而非追击恐怖分子。而阿富汗东部多为农村地区,因此,战略重点又应因地制宜的放在修建道路等基础设施之上,从而将分散的人口连接起来。^①

斯宾塞·琼斯认为,正是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东帝汶等一系列案例支持了基尔卡伦的判断:与当地游击队接触应该优先于应对圣战分子。正是因为有这些鲜活的案例,本书并没有成为一本关于反叛乱的教条式指南。^②相反,基尔卡伦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说明了自然条件和社会结构在反叛乱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比如,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地形和部落对当地事态发生发展的影响力是90%,而跨国恐怖分子的存在和西方国家的反应对事态的影响力只占10%。^③因而,解决每个地区的冲突都需要独特的方法。

对此,莱斯特也持相同态度,他也认为,基尔卡伦凭借案例研究和亲身经验说明了文化、历史和地理在不同地区是如何呈现多样性和发挥独特作用的,因此,企图用千篇一律的方法来应对游击战和恐怖分子是注定要失败的。^④

事实上,基尔卡伦获取这些原始资料的过程充满艰辛。他需要变身为一个军事冒险家穿梭于火山口和丛林中,也需要在战火纷飞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实地考察而非仅仅待在安全地带。甚至有一次当他乘坐黑鹰直升机在巴格达西北准备降落时,地面上的简易爆炸装置差点使其丧命。正是这些来之不易的实际考察是其比那些五角大楼中的盲目乐观者不知高明多少倍,那些人甚至认为伊拉克人对于美军的到来会手捧鲜花,夹道欢迎。^⑤

① George Packer, "Kilcullen on Afghanistan: 'It's Still Winnable, But Only Just,'" *The New Yorker*, November 14, 2008, <http://www.newyorker.com/news/interesting-times/kilcullen-on-afghanistan-its-still-winnable-but-only-just>, 2015-03-16.

② Spencer Jones, "The Book Review of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Fighting Small Wars in the Midst of a Big One*," *War in History*, Vol. 18, No. 1, January 2011, pp. 137-138.

③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p. 226.

④ Lester W. Grau, "The Book Review of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Fighting Small Wars in the Midst of a Big One*," *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74, No. 1, January 2010, pp. 323-324.

⑤ Janine Di Giovanni, "Local War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April 26, 2009, p. 21.

四

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一) 在理论上缺乏综合的比较性框架

该书的观点主要来源于基尔卡伦自己的经验,全书缺乏与其他理论比较,因此,视野略显狭窄。基尔卡伦无法阐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其战术有效的,在什么情况下是无效的,很容易让读者误以为他的战术放之四海而皆准。^①

与此相比,一个拥有比较好的理论框架的例子是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的助理教授保罗·斯塔尼兰(Paul Staniland)的著作《叛乱网络:解释叛乱分子的凝聚与崩溃》。他在书将叛乱组织分成整合的、前沿的、狭隘的和分裂的等四种类型,对每种类型都举出了代表性的组织,并且分析了每种组织社会基础、行为模式、内部结构等方面的不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镇压、共谋、遏制和合并等不同的应对策略。^② 这种分类论述的比较性理论框架说明对付不同类型的恐怖组织需要不同的方法,显然更具说服力。

此外,虽然基尔卡伦反对施行以消灭敌人为核心任务的斩首行动,但在美国学术界,有学者对此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支持,并且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和模型。比如,佐治亚理工学院助理教授杰娜·乔丹(Jenna Jordan)从官僚化程度和民众支持两个维度来探讨斩首行动的有效性,指出对于那些官僚化程度不高且民众支持较低的恐怖组织,斩首行动能够将其摧毁。^③ 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布莱恩·布莱斯(Bryan C. Price)从恐怖组织的组织结构、意识形态、规模、存在时间、打击国的政权类型(民主与非民主)、对恐怖组织头目的处置方式(击毙或囚禁)等变量来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类探讨。^④

^① 此观点受到与芝加哥大学政治科学教授罗伯特·佩普(Robert A. Pape)交流的启发,他也是芝加哥安全与恐怖主义项目(Chicago Project on Security and Terrorism)的主任。

^② Paul Staniland, *Networks of Rebellion, Explaining Insurgent Cohesion and Collapse*,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③ Jenna Jordan, "Attacking the Leader, Missing the Mark: Why Terrorist Groups Survive Decapitation Strik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8, No. 4, pp. 7-38。另外,根据笔者与杰娜·乔丹的交流,她认为,基尔卡伦的以民众为中心的策略不太具备可操作性,这一方面是因为难以将恐怖分子从普通民众中辨别出来,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地人始终会把美军或多国部队视作外来者而难以真心实意与之合作。

^④ Bryan C. Price, "Targeting Top Terrorists: How Leadership Decapitation Contributes to Counterterrorism,"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4, Spring 2012, pp. 8-46.

在地域方面,麦克里斯特尔的经验也证明由于不同的地理条件和人文环境的限制,在阿富汗东部地区成功的经验有时很难复制到南部地区。虽然基尔卡伦在东部库纳尔河谷的案例较为乐观地展示出在当地修建道路可以带来反叛乱的成功,^①但麦克里斯特尔麾下的部队在南部坎大哈阿尔甘达卜河谷(The Arghandab Valley)的遭遇则带来了更多的悲观情绪。该地区的人行为冷漠,他们使用高耸且间距很窄的泥墙来支撑遍布该地区的水果葡萄,这使得行走于其中的士兵如同陷入迷宫。更可怕的是,每条走廊都会完美地将士兵引导至简易爆炸装置和伏击点。而且在春末,茂盛的树叶将这些走廊变为隧道,美军用飞机也无法侦察到里面的活动。^② 这些分析表明,对于以消灭敌人为核心任务的方法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能采取持一刀切的态度。

(二) 未能清晰阐明美国在别国增兵的理由

他在开篇提出的“意外的游击战综合征”包括“感染”“扩散”“干预”“排异”这四个阶段,其含义在于强调外部干预会为恐怖势力联合当地传统部落势力提供口实,客观上反而会促进二者的联合并最终有利于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壮大。对此,基尔卡伦开出的药方是摒弃以敌人为中心的方法,转而以民众为中心,努力将民众与敌人隔离开来。

但是,由于阿富汗、伊拉克等失败国家的军队不可能胜任保护和作战任务,保护当地民众势必要增加美国军队。而美军人数的增加无疑意味着外部势力干预的加大,根据作者的“意外的游击战综合征”的模型,这恰恰会产生更大的副作用。事实上,盖茨也意识到太多美军在战略上存在风险。^③ 一方面,与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一样,部队数量定期增加却不足以结束叛乱,这反而会使敌人在战斗中积累经验和能力,从而变得更加强大;^④另一方面,如果美军在外国境内人数过多,且不尊重阿富汗人的所思所想,他们将被认为是占领者,而非合作者。^⑤ 虽然在伊拉克的案例中,由于当时当地特殊的情势,增兵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这一案例能否复制?在理论和方法上,在别国实施反恐行动

① Kilcullen, *The Accidental Guerrilla*, pp. 87-109.

② [美]麦克里斯特尔:《重任在肩》,第 333 页。

③ Robert M. Gates, *Duty: Memoirs of A Secretary at War*, p. 349.

④ [美]麦克里斯特尔:《重任在肩》,第 314 页。

⑤ 盖茨曾直言不讳的向主张增兵以保护民众的麦克里斯特尔询问他是否考虑过“美国增兵将带来哪些政治和军事风险?”“美国增兵也将意味着战争的进一步美国化,这对阿富汗、北约和其他盟友又有何种影响?”参见 Robert M. Gates, *Duty: Memoirs of A Secretary at War*, pp. 354, 336.

的国家究竟要怎么做才能有效避免产生“意外游击战综合征”那样的副作用？对于这些问题，基尔卡伦并未正面回应。

（三）未能详细地提出保护民众的应对之策

实施以保护民众为中心的策略在现实中有两个问题，一是需要更多兵力。但在美国的党派政治和政军关系的显示约束下，增兵并非易事。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司令大卫·麦基尔南(David Mckiernan)曾要求增兵三万人。在2009年1月23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这一提议得到了时任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的大卫·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迈克尔·马伦(Michael Mullen)的积极支持，却遭到副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的反对。之后经过最高决策层的反复协商，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3月27日才最终宣布批准增兵1.7万名士兵。而2009年6月9日，当盖茨再次向奥巴马总统提出增兵要求时，整个会场都“炸开了锅”，奥巴马总统也表示无法为进一步增兵提供政治支持。^①二是会给反恐军队带来更大的危险。在阿富汗行动中，联军为了避免阿富汗民众的伤亡也不得不限使用火力。但这样一来，实地交战的美军其实面临更大的危险，追击敌人也需要付出更多代价。^②这说明，保护民众和消灭敌人之间存在矛盾，面临取舍，毕竟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目标是“破坏、瓦解、击败基地组织及其在巴基斯坦的藏身处”。^③对于这种矛盾和取舍，基尔卡伦的书中鲜有正面回应，反而只是一味强调保护民众策略的有效性，这也成为本书的不足之处。

反叛乱是一个很复杂的领域，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不同，相应的手段也应改变。虽然本书缺乏综合的比较性框架，在理论矛盾和现实困难方面估计不足，但也许正如作者在开篇致谢中就已阐明的：“本书是一个混合式产物，它或许会因为过于平民化而难以成为纯学术作品。”^④从另一个角度看，该书一手资料详实，案例丰富生动，核心观点发人深省，至少能够为认识当前全球恐怖主义的新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框架。

① Robert M. Gates, *Duty: Memoirs of A Secretary at War*, pp. 337-343, 349.

② [美]麦克里斯特尔：《重任在肩》，第333—335页。

③ 同上，第254页。

④ David Kilcullen, *Accidental Guerrilla*, Acknowledgments, p. 1.